

— 笔 谈 —

菲华文学 :文化承传与现实走向

文化承传是 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

刘登翰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重视中华文化的承传,是所有置身异质文化之外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维系自己独特文化身份和与世界对话的普遍特征。这一情况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使他们有可能为人口弱势(菲律宾华侨华人仅占该国总人口的2%左右)的族群形成文化强势提供巨大的经济基础;二是面对土著文化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菲化”政策的左右,年轻一代祖根意识的逐代稀薄,使文化薪传成为菲华社会的普遍呼声和庄严使命;三是菲律宾历史上一系列对华侨华人的限制、排扩和迫害,从另一个意义上唤醒了华侨华人的祖根意识和文化意识;四是菲律宾华侨华人血缘的延续性和地缘的限定性(90%来自闽南特别是晋江),使他们极为重视血缘文化和地缘文化的传承和固守;五是重视教育为闽人一贯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传承媒介的华文教育和报刊一直受到菲华社会从道义到物质的巨大支持,成为菲华社会文化守成的良知导引和精神象征。

上述种种,都推动了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及其承传的执着与认真。在这一背景下酝酿而生的菲华文学,便把薪火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成为推动自己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菲华文学的价值,首先也体现在文化方面,其次才是文学本身。这是我们考察和研究菲华文学与考察和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稍有区别而应当先予注意的。

在菲华文学作品中,菲华作家除了表现中华文化在菲华社会承传中的危机感、华侨生存现状的漂泊心态以及鲜明的闽南文化特征之外,还注意以我为主地对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吸收和融汇,也值得人们重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各民族文化交往日

益密切的情况下,菲华文学应在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质并对土著文化和其他文化的融汇和吸收中,参与菲律宾社会和文化的建设,改变菲华文学只在菲华社会狭小圈子中自我消费的状况,争取对整个菲律宾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在菲律宾国家文学中占据更重要地位。菲华文学要在菲律宾国家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中有更重要地位,应注意从文化的自觉转入文学的自我。

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

柯清淡 (菲华作协副会长)

菲华文学的现实困境是多方面的。首先,菲律宾文学的生父(中文)生母(华语),只是一个占菲国七千万人口中百分之一点五的仅一百多万华族人的语言文字,主流社会并不应用它,法律上不把它当为法定文字,华族中的年轻一代也渐渐很多人不懂华语,其作用与功能也逐渐下降。另一致命伤是,华侨教育在过去25年的菲华政令下衰退,已日益丧失了对菲华文坛提供写作人才的效能,如没有来自香港和大陆的新生移民,菲华文坛上的中、青辈早已消失了。从功利的观点看,不懂中文华语,无碍于在主流社会谋生,而在菲华小社会里谋生,愈来愈不一定需要中文华语。此外,愈来愈强势的西方文化及土著文化,对中华文化颇具“排他性”,而直接影响到华文文学的延续存在。

“方块字难学”也是菲华学子与家长的普遍感叹,故“学了不懂”或索性放弃中文而改习外文的菲华人口逐年增多,这也使多数菲华家庭中已由文字困难而产生了语言的代沟,菲华华文便成为这矛盾的牺牲口。

在菲华文坛或说是在菲华文学界中,存在着一些阻碍进步的内部弱点,虽然历时几乎相等于菲华文学历史的不同政治立场已渐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消失,但派性及山头主义仍不能完全改变。于是,在华文(中文)读者及作者日趋减少的情状下,文学团体却偏多,以致丧失了“团结方能产生的一切力量和功能”。

在富强的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下,菲律宾中文华语便在华人子弟渐多专攻英文增长率的30年来渐

呈式微,附生于其上的菲华文学便遭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断崖危机。因此,我把菲华文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与中国能否成为富强的工农业大国挂起钩来,因为这能使占全菲人口仅百分之一点五的华人,在现有的优越经济基础上,以中文华语为其优势在菲国与中国的贸易中谋生致富,而促使中华文化及语言在菲律宾复苏及发达,这对受其带动的菲华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必将带来新的前景。

菲华文学中的闽南情结

戴冠青 (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菲律宾华人多数来自福建闽南地区,具有一种积淀尤深的闽南情结。在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圈里,其实际交际语言与家庭用语大多以闽南话为主。闽南话通过文化交流,对菲律宾当地的现代语言词汇的形成甚至发音都产生了突出的影响。文学是以语言为自己的唯一表达手段的,闽南文化通过闽南语言在菲律宾的广泛使用和交流,不能不对菲华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之前内陆交通极不发达,长期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再加上很少进行大工业建设,所以闽南地区长期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中。这种社会形态使闽南文化具有较少受到现代大工业文化冲击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性。不管菲华作家是否意识到,闽南情绪已经毋庸置疑地根植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不能不使菲华文学打上闽南文化的鲜明烙印。

由于菲华文学与中国闽南文化的厚重关系,其许多作家作品,在生动形象地表达他们在居住国的生活和独特感受时,却不知不觉地在民间风俗的描绘、现实生活的叙写,或内容题材的选择、语言风格的运用上,顽强地透露出闽南文化的独特精神指向和意识性。闽南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精神指征就是它的传统性,怀旧、恋根、思乡、爱家、敬畏祖宗、崇尚团圆、铭记源本、眷念亲情、相信缘分等等永远是闽南文化的深沉内蕴和价值观念。因此可以说,对闽南家园的怀旧意念和寻根意识,是菲华文学的重要表现主题。

闽南文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指征是它的世俗性。闽南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闽南人冲淡平和面对现实重视世俗生活的典型性格特征,他们既崇尚拼搏进取又注

重修身养性,既褒扬勤俭持家又讲究生活享受,既鼓励精明能干又倡导难得糊涂。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使闽南人十分注重“吃”和“住”,还十分注重过节。而这些正是菲华文学中最常见的题材。哪怕像诗这样雅致的体裁,有许多篇章也是刻意从世俗生活细节或日常事物入手去抒情写意。

菲华散文的艺术成就

喻大翔 (海南师范学院世界华文散文研究所所长、教授)

菲华散文创作香火不断,形成了一支菲华散文闽籍军团。不但在菲华文学史70余年中单篇、个集与选集收获最丰,且质量也相当高;题材触角广及大陆、菲律宾、香港、台湾乃至世界物事,尤以刻划“中华情结”并进而探索世代“旅人”的复杂心理主题见长;散文文体类型丰富,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令人难忘的文本。尽管菲华散文还有不少缺点需要改进,但在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和散文创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菲华散文因题材与涉及的主题倾向不同,约略可总结出五种范式:

一是丁明式。几乎无需任何理由,海外就是“异乡”、“客地”或“旅地”,自我就是“异客”、“游子”、“流浪客”。反过来,作家当然是以中国为主位,自诩为“大陆人”,甚至干脆将中国径称为“我国”。无处不在的乡愁、国愁、文化愁,就弥漫、浸透在字里行间。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和海外游子的无限情思,在丁明式的散文中有淋漓尽致抒写的。

二是若艾式。在此类散文中,作者大量引用中国文学典籍,在中国文化、文学的历史中寄托、重现或演绎菲华散文作家的个人体验与情思。比如在若艾的散文《初雨》中,征引古今诗人、词人、散文家及其作品在23人计26次以上。

三是晨梦子式。对华人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晨梦子的《瑞狮采青》一文中,针对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以至伤害了老一辈同胞善良的心愿和一种民间形态的文化归属感进行的精神批判是很明显的。

四是柯清淡式。表现的是几代华侨在菲律宾的流血流汗,终于换来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了解与相互尊重。其中柯清淡的《五月花节》是华人融入菲

国文化与社会并开拓主题新层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五是楚复生式。在此类作品中,作者在心理上认同了菲国的文化,并从思维上转向对菲律宾本土人物及其前景的关注,作品中的主人翁虽然非我族类,但鲜明地反映出创作主体的观点与立场,超越华人社区的范围进行体验、对话与思想。

菲华文学现状的概略分析

蔡沧江 (菲华作协副会长)

很多学者在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探索与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对它们的文学特征和文学发展的轨迹作设身处地的理解。一般的评论准则、尺度,大都以中国文学为标识,缺乏以世界民族文化的宏观与微观的健全对照、主客观的传承互动去衡量海外华文文学的优良与不足。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所形成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学风景,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已经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小同大异”了。

经过一代代华人的努力与奋斗,如今的华族已经不是过去寄人篱下的“另类”,而是一个与当地族群基本平等,自成一体的少数民族。华族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融合到菲国主流社会中,促使其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菲国政府的重视和肯定。在如此良好的氛围下,菲华文学也逐渐体现了华族文化积极向上的精神经脉,对华族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由于作者背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菲华作家的创作主题,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菲律宾从事华文创作的作者,目前的人口大约一百五十位左右,移民的作者占75%,本土的作者占25%。如果我们将菲华文学分成三个主要时期来分析,我们便能很清楚地看到,由于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创作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其作品主题思想的差距更大。在70至80年代,无论教育程度还是经济实力,移民作者都占了很大的比例,作品主题也从50年代之前的占50%的“思乡怀旧”转到了融合本土、落地生根的文化理想。这其中的变化,更进一步说明了华族社会文化的变化与整个国家的政策开放以及生存环境的变迁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菲华文坛里接受本地教育的作者已近没落,呈日薄西山之态;而90年代的新移民作者情结,大抵还离不开“乡愁”主题与“台海政治”迷思;面对这一状况,如何从作家本体论和文学本体论上理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便成了菲华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还有,众所周知,菲

华作者几乎百分之百是业余作者,经济上的收入也决定了作者从事创作以及文艺活动的时间、经费的筹措难易等问题。

抗战前夕菲华文艺期刊特点

朱双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笔者觅见之早年菲华文艺期刊,虽然数量不多,却颇具代表性,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它们包括四种不同的刊物,其中三种为创刊号,出版时间分别为1932、1934、1936和1937年;它们既有文艺刊物,也有文艺份量不同的综合性刊物以及纯政治宣传刊物。从中可窥见当时菲华文艺期刊乃至菲华文坛的若干特点:

其一,这些刊物都紧扣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当时最重要的时代主题,即日、德、意欲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日本侵占东北后魔爪伸向华北,中国面临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与日寇死战,救国图存。

其二,这时的菲华文学表现出对“中国”的格外关心,特别是与福建格外密切的亲缘关系。编者一再说明,刊物的正常编辑和出版,有赖于来自厦门、泉州、漳州的稿子。无论是读者、作者或编者,最关心的是家乡的近况,希望得到或传达来自家乡的消息,因此,无论是通讯报道或是文学创作,讲的大多是中国特别是福建的事,或是表达漂洋过海、离井背乡的悲凄。可见,当时的华侨尚未有扎根(移居国)本土的观念,而是有特别强的祖国认同、家乡意识。这是早期和近期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三,当时的菲华文学创作显露了与“五四”至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密切因缘关系。“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父权夫权等思潮,成为不少作品的题材和主题。许多作品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左翼革命文学倾向。它们向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倡扬阶级斗争,甚至公开表达反蒋拥共的立场,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统治阶级加以揭露和抨击,其勇猛激烈,毫无顾忌,比起中国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能与菲律宾已非国民党势力所控,少了一些言论的钳制,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华文文学的“边缘”,其特有的革命性,在这里得到明显张扬。

最后,这时的菲华文学创作虽已初步掌握了新文学的一些创作手法,有的还写出了地方特色,颇为生

动,但无论在艺术构思上或是写作技巧上,都显得较为青涩、幼稚。

千岛诗人的不足之处

宋瑜 (福建《台港文学选刊》主编助理、副编审)

20世纪80年代后集合了大批诗人的千岛诗社,是菲华诗坛的代表,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作,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有待提高。

其一、过于倚重观念和演绎观念,主题行钎而意图钻研,未能很好完成诗的形式转化(某些取譬的诗亦然)。其二、诗固简短,可见创作上的仓促;有时不乏精致之作,但常见失于言诠,落于直露。或存在抽象的概念语,如豪情、罹、寂寞、苦涩、辛酸、迷惘、甜蜜、永恒、美丽、苍白、坎坷、欢乐、悲哀等等(这些词并非绝对不可用,问题在于用时的美学含量);或简单从一概念出发寻找相应的形象载体,那种以一个形象(比喻或象征物)贯穿全诗的写法,有时也难免牵强,反造成诗的松散或空泛,因难免需要解释、说明、连接,造成许多过渡性的言说,使诗的气韵、旋律受阻;而一种结构坚实的诗,其意涵若未能从内部敞开或朝外部放射,便造成诗意的生硬、板结。其三、每个诗人的风格特点尚不太鲜明,较少个人化的语调、语感。因此,诗的文本价值难免受到削弱。

从总体而言,一种存在命运与文化立场既构成千岛诗群的诗资源,又因其过度的张显而为他们的诗美学设置了难度,成为需要跨越的沟坎。然而艺术上的缺失是可以改进而得到完善的。在千岛诗人诗学梦想的展开上,笔者注意到一种从种子到果实的写作,亦即由此及彼、有实纳虚、由陈出新、由近及远的写作。一个生命过程:对时间的长河而言它是重复,对于个体的存在来说它又是真切的、一次性的和充满鲜活诗意的。诗意由种子所带来,它经由一个浓度到达果实,从果实向外发射。

诗意的超越除了对寻常事物、一般诗情或一个常规词(如“时间”)的超越,还表现在对一个已有命题的超越,这是一个从种子到果实,再到果实的全方位韵律之飘升的过程。华侨精神的所由来与所由去是一个基本诗命题,当然不可漠视不可回避,但以诗言之,它的特殊性又必通达人类的广泛性;反向而观,它的特殊性也才能被真正树立并凸现出来。

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人的焦虑

王列耀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

由于多种原因,菲律宾处在全球化的最前沿,几乎是毫无遮拦地裸露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之下。漫长的西方殖民的历史与依附的政治、经济形态,教育的西方化、许文化的古文化,更加之宗教的西方化,都说明与强化着这种前沿性与裸露性。

菲律宾华文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文化处境:既不可能改变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塑造出一种宗教文化,更不可能削弱日趋强大的“全球化”背景,而且,还面对着一个弱势民族所不得不面对的华族文化的失根与“失我”问题。

作为菲律宾的华文作家,首先必须正视自己是菲律宾的国民,“生活的根,作为国民的根,系在菲律宾”,对国家,负有义务与责任。同时,他们又生活重视自己民族文化的本性,即将“文化的根,作为华族的根,系在中华文化”。但是,华人在菲律宾毕竟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西化的社会风气、商业时代的生存压力、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通与磨损、国家对华文等的限制等,都日积月累地消磨着华族的文化之根,消耗着华族的民族特性。

民族间的通婚,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必然,也是海外华人在所在国自下而上与发展中的必然。但是,由于菲律宾的华人处于“极少数”,民族间通婚的结果,将直接导致下一代对华语与华人文化的疏离,成为所谓“失根的兰花”。故而,“菲律宾华人的焦虑”,首先是对民族通婚带来的尴尬处境的焦虑。作为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即使是保持住了血统的纯洁,也难保文化的根基与“自我”不被磨灭与损耗。故而,“菲律宾华人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淹没的焦虑。

更严重的问题是,血统并不等于“文统”。纯正的华人后代,受到当地文化、政治、教育、宗教等影响,重英语、轻中文,结果是“话”说不好、“字”不会写、“书”也不能读。华族的文化根基与“自我”,面临着被自己的子孙所遗忘的危险。

关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人的焦虑”,这是菲华作家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有意也是极有意义的文化选择。

(责任编辑:包恒新)